



葛兰西文选

(1916—1935)

葛兰西文选

(1916—193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师颀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有：毛韵泽、
宋洪训、陈 玮、李贻良、夏道源、
纪 涛、李吟波

葛 兰 西 文 选

GELANXI WENXUAN

(1916—1935)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875印张 510,0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01-001110-9/D·369 定价 10.35元

编者序

一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意共创始人之一,曾任意共第二任总书记(1925—1926)。他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意大利实际,他的革命理论一直是意共制定策略的基础,陶里亚蒂在意共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葛兰西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行动不能局限于经济要求,而必须正视意大利国家在历史上的形成所造成的一切问题,必须扩展到政治、思想和文化等上层建筑的领域里去,在这些领域里,新与旧的矛盾以及旧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必须通过彻底的批判和斗争予以破坏和摧毁。要是没有葛兰西的指导,我们的道路就要艰难、曲折得多,我们的进展也要缓慢得多。”^①

70年代初,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重新抬头,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样,葛兰西的关于革命改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引起西欧的左派力量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认为,葛兰西的政治理论截然不同于他同时代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他是个上层建筑的理论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经济决定论和极权主义作了决裂,强调了人类意志和思想的重要作用。他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把马克

^① 参看《陶里亚蒂言论集》,第3卷第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思主义的分析从对经济和自然科学的领域，转向哲学、知识分子、人民群众的心理以及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机构。他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描写成历史必然的产物，而是把它当作人类必须通过创造性活动才能赢得的一枚不轻松的金牌。

80年代后期，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风云骤变，形势出现逆转，于是再一次掀起各国学者对葛兰西理论的研究“热”。

二

葛兰西 1891年1月22日诞生于撒丁岛阿莱斯村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1905年，他读完桑图卢苏朱和卡利亚里的中学，1911年考上了都灵大学奖学金，开始接受大学教育。尽管菲薄的奖学金和不固定工作的收入只能维持清苦的生活，但他在文学系中是语言和语言学方面成绩优异的学生。

在都灵这个工业大城市中，葛兰西有很多机会参与或接触到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运动。1914年，他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第二年他放弃了大学学业，开始为都灵社会党《人民呼声》周刊撰稿，后来成了该周刊的编辑。1917年8月，都灵工人举行的为时5天的武装起义失败之后，社会党都灵支部的大多数领导人被捕，他被选入社会党临时委员会。12月24日，为了庆祝俄国革命，他为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写了《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当时列宁的著作还没有意文版本，葛兰西是依靠自己的观察和判断来评价俄国革命的。

1919年5月，葛兰西同他的同学陶里亚蒂、塔斯卡、特拉契尼共同创办《新秩序》周刊；6月，该刊发表了他同陶里亚蒂共同执笔的《工人民主》一文，提出应当把工厂的“内部委员会”改造成“无产阶级权力机关”——都灵“工厂委员会”。此后，《新秩序》周刊成了都灵工厂委员会的机关报，也是社会党内第三国际支持者的喉舌。

葛兰西参加起草的《都灵社会党支部的行动纲领》在该刊发表后，得到列宁的支持和表扬。

1921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召开里窝那代表大会，会上党发生分裂，左翼反对派自行成立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是，把革命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工厂委员会的直接行动上的“新秩序”派在党内没有产生主要的影响，而起主要影响的则是总书记博尔迪加所强调的纪律、集中制和原则的纯洁性。葛兰西认为，博尔迪加把共产党作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力量，这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它应当同反法西斯的群众结成广泛的联盟。他继续主张“工农委员会”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表达方式；共产党只有在同那些独立的无产阶级机构并行的道路上才能得到发展。这时，葛兰西仍留在都灵担任《新秩序》的编辑，周刊改为日报。

1922年5月，葛兰西作为意共代表被派往莫斯科。在逗留的一年里，他会见了那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由于健康原因他还在莫斯科近郊“银色的森林”疗养院呆了几个月，在那里结识了未来的妻子朱丽娅·舒赫特。11月5日，葛兰西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心思想是革命的政党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却。葛兰西在莫斯科深入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并受到列宁思想的熏陶，他开始认识到列宁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性。1923年11月，他被共产国际派往维也纳去担任国际新建的一个反法西斯活动机构的领导工作。他观察到国内形势越来越紧张，意大利法西斯的镇压越来越残酷；无产阶级革命看来非常遥远，这时他关心的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重建民主秩序、北方工人阶级最低层同南方农民群众建立联盟的问题。1924年2月，他在这里创办了新的意大利共产党报纸《团结报》，宣传他的关

于上述问题的观点。同时，他同原来的“新秩序”派的老战友，如陶里亚蒂、斯科奇马罗等人，讨论建立一个没有博尔迪加参加的新多数派中心的问题。他认为党应当同非党群众，也就是同广大居民建立联系。3月，他重新出版了面向非党人士的刊物《新秩序》双周刊，再次提出建立工厂内部委员会的建议，这是因为意大利最大工会组织劳工总同盟的改良主义领导人越来越同法西斯主义采取调和态度。此外，他认为办这个刊物在党为争取实行一个新战略的政治运动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924年4月，葛兰西当选为威尼托议员，这样有了豁免权就能回国。5月1日，他离开维也纳回到意大利。他在议会的第一次讲演，驳斥了墨索里尼在议会提出的取缔“秘密社团”法，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残暴和反对工人阶级的行径。同时，在他的建议下，意共还建立了“国外中央”，以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1924年6月，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特奥提在向议会发表一篇指责法西斯的反民主政策的讲演以后，被一伙法西斯党徒暗杀。于是议会中各反对党离开议会在亚文丁山召集会议，要求国王罢免墨索里尼，并严惩凶手。葛兰西出席了反对派的会议，提出要依靠全国的力量举行一次总的政治罢工。他认为只有动员群众才可能使法西斯专政垮台。但是其他反法西斯党派坚持用温和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11月，意共议员退出亚文丁，重新回到议会。1925年1月，法西斯终于进行反击，掀起了新的镇压浪潮，把这场为时半年的政治危机平息下去了。

1926年1月，意共在法国里昂秘密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标志着意共战略明显转变的一次代表大会。葛兰西的路线是：实现共产国际提出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组织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使这两个阶级建立起革命联盟、统一战线作为揭露改良主义的手段。他的路线获得90%的选票，并当选为意共第二任总书记。

1926年11月初，墨索里尼借口有人企图暗杀他，通过一项“非常法”，把所有反法西斯党团都视为非法而一概取缔，就此把意大利最后一点点自由都取消了。11月8日，葛兰西被捕，当时他年仅35岁。1928年5月，墨索里尼的特别法庭判处他20年4个月零5天的监禁。在狱中8个月以后，他就开始写著名的《狱中札记》，这似乎是对检察官的宣判词：“我们必须使这个脑袋停止工作20年！”的极大讽刺。1937年4月27日，他在提前刑满释放后3天在罗马“圭西萨纳”医院与世长辞，终年46岁。10年囚徒生活中留下的《狱中札记》（共2848页，约100万字）在法西斯监狱官的眼皮底下被巧妙地偷运出来，通过苏联大使馆外交邮包寄给在苏联的意共领导人。直到10年之后即1947年，埃伊诺迪出版社终于使该书问世。

三

这本《葛兰西文选》的文章选自《葛兰西政治论文选》（两卷本，昆丁·霍尔编译，1977年和1978年英文版）、《狱中札记》（昆丁·霍尔编译，1978年英文版）、《狱中书信》（林恩·劳纳编译，1975年英文版）、《葛兰西文选》（三卷本，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7—1959年俄文版）。

《文选》译文根据葛兰西思想的发展阶段和他的文章著作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他的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1911—1918），即从进都灵大学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选译了4篇文章。其中《社会主义和文化》是他早期提倡文化重要性的作品。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一）他认为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和意大利哲学家贾·维科真正触及到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范围和原则，前者主张“文化的至高无上的问题是赢得一个人先验的自我，同时又是他本人的自我”；后者主张，了解自己产生的自我会对平等和政治权利提出要求。人性平等的意识是古代的民主共

和国产生的基础和历史原因。(二)文化并非是百科全书的知识,而是“一个人内心的组织和陶冶……人们借助于文化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三)文化不是通过自发演变产生的,而是逐渐通过历史作为“明智判断的结果”。开始是少数人,后来是整个一个阶级都有这样的明智的判断。

葛兰西的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1919—1920),即从创办《新秩序》到领导“工厂委员会运动”失败为止,我们选译了23篇论文,主题围绕着“工厂委员会”的理论问题,如《工人民主》一文中,他向工人阶级提出了三点精辟的建议:(一)利用现在的组织“内部委员会”发展成一个既能实现当前真正的工人民主,又能适应将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组织就是工厂委员会;(二)这个组织同资产阶级国家相抗衡,“并立即准备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履行与掌握同管理国民财富有关的一切主要职能”;(三)工厂企业和它的“内部委员会、社会党的基层支部、农民公社是劳动者必须在其中进行活动的生活中心”,“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关于《工团主义和委员会》这篇文章的产生,是由于工厂委员会运动在发展过程中,该组织同社会党和工会的职能发生了矛盾,后者的一些领导人指责葛兰西为工团主义者,葛兰西为此作出公开答复。他在文中指出:(一)工会官员存在着“官僚主义”,使他们对全国范围内工人运动的危机有目无睹;而且工会无力帮助工人培养革命意志,工会领导人从来不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二)工会只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活形式之一,而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的潜在形式,因此它无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三)依靠劳动群众的威力,根据劳动地点和生产原则组织起来的工厂委员会体制的观念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事这项运动的人不是工团主义者,而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为了社会党的新生》一文，是由葛兰西执笔作为社会党都灵支部和省联合会代表们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提出的一份报告，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意大利的阶级斗争将出现两种局面：或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者是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反动派十分猖獗；（二）社会党的领导机构根本不懂得当前发展的革命形势，也不懂得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应起的作用。社会党只是扮演着事件的普通旁观者的角色，没有对工人做组织、教育和领导工作，以使他们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三）领导机构既不了解情况又无所作为，原因是党的领导人不深入到工人阶级斗争的现实中去。因此，社会党成了“官僚主义”组织的一部分。这份报告还警告说，由于社会党不知道群众的需要和抱负，群众就会抛弃社会党；要避免这一命运，只有把社会党改变成一个“同质的有内聚力”的政党，也就是一个“具有自己学说、策略和严格纪律”的共产党。

葛兰西的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1921—1926），即从意大利共产党的成立到他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逮捕入狱为止，我们选译了8篇论文和两个文件。关于论述法西斯的有《意大利危机》、《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关于论述南方问题的有《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关于把意共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有《意大利的形势和意共的任务（里昂提纲）》。《里昂提纲》中提出了当时党的三大基本任务：（一）为了革命，把工农业无产阶级组织和统一起来；（二）把取得革命胜利和建立工人国家所必需的一切力量在无产阶级周围组织和动员起来；（三）把举行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问题摆在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面前，并通过一系列局部斗争，从政治上和物质上指导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此外，反映党内葛兰西同以博尔迪加为首的极左派之间在一些主要观点上的论战有《由中央委员会提名最后审定里昂代表大会文件的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这里，葛兰西提出，意共领导同

极左派的意见分歧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同党及其领导机构的性质问题有关。葛兰西认为，在给党下定义时，必须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党在事实上不仅通过意识形态，也通过一种“物质”的结合同工人阶级联合在一起，而这是同党对工人阶级必须承担的义务有密切关系的。而极左派则把党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机构”，这样，极左派把工人和来自其他社会阶级的分子相提并论，它不关心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极左派认为，知识分子是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最先进的分子，因而注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党也就成了工人阶级的一个“机构”。第二个根本问题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单枪匹马来夺取政权，它需要有同盟军，党必须遵循这种政策，才能使它在具有反资本主义利益的其他阶级中居于领导地位，并且在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中对它们进行指导。此外，工农联盟问题同工人阶级组织及其政党的问题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总之，党的策略旨在赢得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产生决定性影响，以便在实际上引导工人阶级走向革命。而博尔迪加则认为，党不应当在任何时刻都提出赢得大多数的问题，而是在长时期中应当只限于对总的政治原则作宣传活动。

葛兰西的思想发展的第四阶段(1927—1937)，即从葛兰西被捕入狱到他逝世为止，这是他从年轻的鼓动家、政治家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时期，我们选译了《狱中札记》中的《现代君主》、《国家和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问题》三部分；《狱中书信》16封。葛兰西在《现代君主》的札记中把马基雅维利称为“最早的雅谷宾”。他说，“现代君主”(即共产党)必须是一支同农民结成联盟和形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雅谷宾”力量。可是，在意大利的历史中始终没有出现过有效的雅谷宾力量。在城市无产阶级兴起和具有一定历史政治文化条件下，这个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只有使大批农民自发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才有可能。他认为，党要

成为市民社会的新机体，即党是社会的一部分，它要比其他部分更“自觉”，并且是市民社会中的主要部分，才能起到“现代君主”的作用。

在《国家和市民社会》这部分札记中，葛兰西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性质、适用于西方的革命战略等。他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看作是消极革命的一种形式。所谓消极革命是指在发生有机危机时，不依靠人民的积极参加，而只是通过国家机关的作用，从上面对国家的经济结构作相当广泛的改革。历史上法国的大革命和意大利复兴时期的统一运动就是明显的对比。前者雅各宾党人通过支持农民的要求同农民结成联盟，动员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后者加富尔及其温和党很少依靠人民大众进行斗争，他们的主要手段是皮埃蒙特公国及其军队、它的君主政体及其官僚机构，才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由消极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家，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只能得到一部分领导权，意大利后来的历史标志着它是一种妥协的体制，这种体制很不稳定，也缺乏人民大众的支持。因此，复兴运动时期奠定的意大利自由民主国家的衰落，是使 20 世纪 20 年代法西斯得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关于适用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战略，葛兰西是分析市民社会而得出的结论。他认为，那里的市民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原因是经济的迅速发展、高度集中，社会化机构越来越多，群众的思想受到资产阶级的蒙蔽、歪曲宣传，已逐渐结合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此外，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工人贵族，建立起了工会官僚制度以及社会民主集团，这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高度的制度化和国际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这种环境下，对国家进行正面攻击的“运动战”已经不适用了，否则暂时取胜的革命力量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大量敌对民众，他们仍然被束缚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樊篱中。只有采取“阵地

战”，即在文化战线上不断地渗透，颠覆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庞杂机构，攻克一个接一个的所有市民社会的机构（例如新闻出版机构、学校、工会、教会等），才能夺取政权。总之，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建立一个“相反的领导权”，是革命成功的前提；但这不是简单地由一个领导权取代另一个领导权，而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原则把一个受资产阶级思想蒙蔽的情况改变成揭露剥削制度的领导权原则。照葛兰西的说法，“阵地战”在政治上就是两种领导权原则之间的斗争。“阵地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而是长期艰苦的文化斗争，需要发扬首创精神，一旦“阵地战”取胜，政权就成定局。

《马克思主义问题》这部分札记主要是研究哲学问题，其中有批判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一书的《关于建立通俗社会学的一种尝试的批判札记》。葛兰西评论说，这本书的标题与书的内容不符，总标题“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副标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联系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加以说明和证实。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社会学，是恩格斯已经批判过的错误观点。《通俗读本》的出发点是假定，而不是以批判地分析常识哲学为出发点。在常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唯物主义的成分，都是天然感觉的直接产物。这同宗教成分一点也不矛盾，不过后者是“迷信的”，非批判性的。《通俗读本》不是采取科学的批判，而往往是加强这些非批判性的成分，这是它的一种危害所在。

葛兰西批判说，《通俗读本》对任何一种辩证法都没有加以论述。它对于形而上学和思辨哲学没有进行批判，这是由于作者并不真正了解形而上学的概念。作者一开始想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学”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学恰好意味着朴素的形而上学。作者对那些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存在于具体历史著作

中的批评者根本无力回击，他未能按照真正辩证法的观点，提出并解决柯罗齐按照思辨的观点提出的那些问题。《通俗读本》中的旧形式而上学，其最显眼的痕迹之一是企图把每一件事情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最终原因，这证明它就是一种“寻找上帝”的表现。

《通俗读本》把全部过去的哲学都看作胡言乱语、一无是处，葛兰西认为，这即使不是一种反历史的谬论，也是事实上的形而上学的残余，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古人的思想同今人完全一样，否则便是时代错误。有些哲学体系固然已被超越，但这并不排斥它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不少的作用。对于这些体系的衰微，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要从现实辩证法的角度去认识。

关于《狱中书信》，我们选译了1927—1932年期间葛兰西主要写给他的二姨子塔齐娅娜等人的信。塔齐娅娜在葛兰西系狱10年中一直到处奔波，从购买药物、营养品到书报杂志，从中转书信到聘请医生、律师，莫不由她代劳。葛兰西写的这些信有些反映了他在狱中的心理状态，如他在1927年6月6日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的处境并不十分美妙。但是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会根据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所保持的感情而改观。我很冷静，对一切处之泰然，充满信心……我相信我绝不会就此在狱中了却一生。”此后几乎过了两年，即1929年4月22日，他在致塔齐娅娜的一封信中写道：“过去，我总是克制自己要忍耐，以便同笨蛋和讨嫌货相处（根本无法避开他们），如今已不再有任何紧张感——监狱的惯例和自卫的本能已经使我养成了忍耐的习惯。有时我变得麻木不仁或漠不关心，这种精神状态缠住我不放。”又过了一年，1930年1月13日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至于我的心情，我想你是难以理解的，其中有好多因素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从以上书信内容来看，他也偶尔产生一般入狱者感到孤寂、灰心丧气的心情，不同的是他能用意志的力量控制消极情绪，克服病

体的痛苦,把感情和思想转向阅读和革命的理论研究工作。

从很多信中看来,他的革命的乐观主义使他在狱中的精神生活显得丰富多采。他同塔齐娅娜讨论哲学、文学、戏剧,甚至花卉、植物,以至佛教、犹太人。他自学多种外语,阅读各种书籍杂志并做笔记。1927年3月29日,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我想订个计划,认真而系统地研究问题,使我的精神生活有所寄托……第一,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史,他们同文化思潮的渊源及其派别,他们各自的思想方式,等等;第二,研究比较语言学;第三,研究皮兰德娄以及在他大力倡导下形成的意大利戏剧趣味的改变……”。

在狱中搞研究工作,实际上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首先是资料匮乏,其次是思想上的各种干扰。1927年5月23日,葛兰西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由于精神状态以及实际情况,不可能进行名副其实的,我很难做到集中精神,专心致志于某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只有全神贯注,我才能弄明白手头这些材料的全部可能的关系,并把它们理出一个头绪来。”这也说明《狱中札记》是个痛苦的创作过程。

这些信里也反映了葛兰西对柯罗齐和马基雅维利这两位意大利人具有浓厚的兴趣。前者是他学生时代所崇拜的人,而这时已成了他札记中的被批判者。由于柯罗齐对意大利和英国的影响很大,因此,他认为柯罗齐有点象“一位世俗教皇,是领导权的一种极有效的工具”。1932年5月,他在给塔齐娅娜的信中写道:“柯罗齐的历史观必须被解释为‘思辨’和‘哲学的’,而不是伦理—政治的。这种历史观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他在这个时期展开了对柯罗齐哲学的剖析,而不是一味追从了。

马基雅维利是他制定党的理论所研究的对象。他在1927年11月14日给塔齐娅娜的一封信中表示想购买《马基雅维利全集》或《选集》。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曾经寄希望于增加和发展军事组

织，能形成城市对乡村的领导权，因此，他可以算是第一位意大利的雅谷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编译这本《葛兰西文选》，目的是向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理论教育工作者综合介绍葛兰西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和文艺书信。我们在编译过程中增添了部分注释，凡释文后面注有“编者”字样的均为我们增添的注释，其余则为原编者的注。标有星花的是葛兰西的原注。由于《狱中札记》和《狱中书信》部分中出现的原注数量较多，作为脚注不好处理，因此一律改为书后注，注符为不带圈的阿拉伯数字。本书选材的取舍是否准确，译文的处理是否妥当，都可能存在问题，敬请读者指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所

1991年5月

目 录

编者序	(1)
-----------	-------

政 论

社会主义和文化	(3)
反《资本论》的革命	(9)
阶级的不妥协和意大利历史	(14)
俄国的乌托邦	(25)
共产国际	(34)
工人民主	(37)
夺取国家	(42)
工人和农民	(49)
革命的发展	(54)
都灵省的政治斗争	(59)
工团主义和委员会	(83)
革命者和选举	(88)
政权问题	(91)
党和革命	(97)
首先是更新党	(102)
都灵社会党支部的行动纲领	(107)
执政党和执政阶级	(112)
为了社会党的新生	(118)